

圖書館學研究的典範危機

賴 鼎 銘*

Abstract

This article surveys the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The article starts with types of research, and is followed by a brief discussion of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Next, the problems and criticisms of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are addressed followed by an examination of paradigm crisis in the current positivist's research approach. The article then introduces Michael H. Harris' alternative paradigm, and concludes with the need for testing Harris' theory to see its applicability.

壹、什麼是研究

什麼是研究？基本上，研究是一種對任何事物的任何批判性的質疑。最重要的，這種質疑却必須奠基於一種嚴肅且系統化的程序，而它的發生常是在人類碰到問題而極思解決的時候①。席位 (Jesse Shera) 認為研究的目的是在發掘新的事實，或事實之間的新關係②。

一般而言，研究 (Research) 可分為二種：基礎性研究 (Basic research)，與應用性研究 (Applied research)。前者傾向對現象的了解，而不注重研究的結果是不是會被應用。換句話說，它常為知識而知識。其研究方向常來自基礎性與學術性的問題。也因此，基礎性的研究比較具有原創性與理論性的特質。也因為這些特質，基礎性的研究有時又被稱為純粹研究 (Pure research)，或理論性研究 (Theoretical research)。應用性的研究則傾向實用主義 (Pragmatic)。它的目的很明確，而且其目標旨在解決當前實際的問題，或企圖發現能馬上被應用在實在界 (Real world) 的新知識。③

* 著者現任淡江大學教育資料科學系副教授。

貳、圖書館學為什麼需要研究

自1930年以來，圖書館學必須進行研究的呼聲即不絕於耳，如果我們歸納這些呼籲，則其原因可大別為下列數點：

一、為了生存下去

郝舍與史來德 (L. Houser and Alvin M. Schrader) 指出，為了進步，甚或為了存活下去，一個職業必須掌握一組科學性的知識，而這包括以理論為基礎的研究活動與研究方法，及實務的運用。^④

二、為了提升圖書館行業的地位

早在1930年初，威廉遜 (C. C. Williamson) 即認為，如果圖書館要提升成為社會機構及教育主體，我們必須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精神，來探討我們的問題^⑤。威爾金遜 (John Wilkinson) 更指明，圖書館事業常常是除了圖書館員以外，一點都不重要的一個行業^⑥。而如果我們要成為一個真正的職業 (Profession)，只有依靠研究來達成建立一個真正職業所需的知識基礎 (Knowledgebase) 與理論架構 (Theoretical framework)^{⑦⑧}。事實上，研究是一個學科成長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它不僅可以提供各種研究成果，以加強各學科的知識背景，而更重要的，這些研究累積下來的知識可以被綜合與分析，從中建構各學科的理論^⑨。

三、為了建立自己的理論，以成為科學

布夏 (C. H. Busha) 指出雖然我們已能有效地管理圖書館，而且我們也知道很多讀者的資訊需求，但很不幸地，在學術上，想把圖書館當成一門學問的看法，並沒有在學術界被廣泛的接受，他認為這種缺乏承認的情況與圖書館員建構理論的牛步化有關^⑩。

雷瓦德 (W. Boyd Rayward) 認為圖書館「科學」的追求雖在圖書館界被認為可能，但遺憾的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廣泛、明確、具完全整合性、系統性、與科學性的理論性與實務性知識。也因此圖書館學是不是「科學」也遭致嚴重的批評，連帶地，它到底是不是一個職業也產生了問題^⑪。

這也是為什麼哥德荷 (H. Goldhor) 指出，目前圖書館學最需要的乃是普遍化的真理，而這種只有研究才能幫我們發掘。圖書館員縱有廣泛的經驗，但是除非我們能發展放諸四海皆準的律則，圖書館學只能算是一門技藝 (An art)^⑫。如果圖書館想成為科學，第一個要求就是要有人能作研究，第二個要求則是

必須有一大批人能評斷完成的研究結果，去蕪存菁，並進行進一步的修正^⑭。

叁、圖書館學的研究簡史

郝舍與史來德指出，1928年以前的圖書館學教育是一種非科學性的學徒訓練^⑮。圖書館學真正有所謂「研究」的開始，係起於芝加哥大學在1928年成立的圖書館學研究所^⑯。布夏即指出，1930年到1950年之間美國共完成了68篇圖書館學的博士論文，而所有這些論文皆屬於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的產物！^⑰換句話說，此期的研究多半是由芝大的教授及學生所完成。但此期的研究則比較傾向於「什麼」(What)的研究。換句話說，它比較傾向於描述性(Descriptive)與歷史性(Historical)的研究，大部份的研究旨在對圖書館的特定現象有一個更清楚的了解^⑱。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部份研究人員開始探討「如何」(How)的問題；例如什麼現象會與圖書館或資訊的發展相關？但是大部份的研究仍然限制在描述性的研究^⑲。布夏即坦然批評此期的圖書館學研究人員在使用實驗方法及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方面，落後行為科學家、物理學者及社會學家甚多^⑳。

1960年代始，美國圖書館的發展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此時期最重要的特色在於美國政府的強力經費支援，例如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即在鼓勵進行改進圖書館服務方面的研究，諸如資訊處理、儲存、傳播所需新技術、新系統、新設備的研究^㉑。另外，部分政府機關也積極以基金的方式進行研究與發展。例如，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的機讀目錄(Machine-Readable Catalog)、國立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的醫學文獻分析及檢索系統(Medical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Retrieval System-MEDLARS)等。^㉒

另外，自1950年起成立的多所圖書館學博士班，對於圖書館學的研究更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例如：

- 1951 University of Illinois
- 1953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1954 Columbia University
- 1959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 196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與 Rutgers University
- 1968 Indiana University 與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1969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 1970以後相繼成立的則有：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Texas.⑳

肆、對圖書館學研究的批判

然而，諷刺的是，依照南西藍 (Nancy D. Lane) 的研究，就1930到1969年間的 289 個圖書館學博士而言，有38%的人畢業後一直都沒有發表過文章。而有78%的人則在 3 到40年的服務期間內發表不到四篇論文（不管是專論、期刊論文、或教科書）㉑。由此可見當時的學生拿博士的目的仍偏重於為個人的工作晉升，而不在研究與學術的追求㉒。柴爾德 (Childers) 的分析亦指出博士的增加並不代表研究工作的增加，60%獲有博士頭銜的人表示他們自拿到學位後並未發表過任何研究成果㉓。甚至圖書館學研究所教授們的出版品亦被批評為量少且質亦不佳㉔。哈理斯 (Michael H. Harris) 即不諱言地指出圖書館學的研究一定出了某些關鍵性的錯誤㉕。

自1930年以來，多位學者即陸續尋找圖書館學研究遲遲無法開展的原因。例如威廉遜認為這乃是因為一般圖書館員都是經驗主義者，而非科學家。大部份行政程序與技術過程之被採用，只是因為他們曾在某些地方被用過而且有效㉖。威廉遜認為另一個原因，乃是圖書館員並沒有接受過科學方法的訓練㉗。另外一方面，圖書館員也有一種根深蒂固偏見：他們很怕將圖書館的業務曝露在科學的檢驗之下。他們認為聰明、常識豐富、勤奮、奉獻及一顆服務的心即可問心無愧㉘。對於圖書館行業而言，主要的兩難經常是大部份的從業人員不願意且排斥去了解科學探索的本質，而這種抗拒感在電腦與自動化的加入後更形明顯。也因此 Grotzinger 認為圖書館已經在轉捩點，如果我們不能進行脫胎換骨的工作，圖書館界將無法完成有意義的研究工作㉙。

雷瓦德 (W. B. Rayward) 則認為，雖然我們已經有很多研究，但是十九世紀圖書館員的經驗主義仍然很明顯的遺留在現今的圖書館學中。換句話說，大部份的圖書館員知識一直都停留在實用主義的階段，而這種知識乃是透過圖書館實務與同事經驗的分享而產生的。易而言之，圖書館學的核心知識仍然是經驗式的。也因此，它永遠無法進化到一個廣泛且經過客觀與系統化檢驗的知識㉚。席拉則指責因為圖書館研究的經驗色彩，及過度依賴地區性的觀察與有限的資料，它常變成偏狹性的研究而無法達到普遍化的運用㉛。

哥德荷即指出，傳統上有二個最廣為使用的追求知識與真理的方法。一是透過權威或傳統。這些權威或許是族長、教會長者、或學者。長久以來，人類多以這種方式獲得知識。但這種方法有其限制性：它很難發掘新知識，也不允許對舊真理的驗證或修正。而且以前被接受的真理，並不能適應新的環境³⁵。第二個方法是由人類自己的經驗，也就是人類由試誤 (Trial and Error) 的過程中，逐漸累積而成。但它却不是有系統性與有效的方法，而且也很難綜合成有用的知識³⁶。而哥德荷認為圖書館員過去迄今幾乎是透過試誤的過程在累積知識³⁷。

這也是為什麼布夏與哈特 (Stephen P. Harter) 認為前此至今的圖書館學研究是屬於應用性的研究，就如任何在發展中的學科一樣，它的理論基礎很薄弱。現有的研究結果僅能有助於對圖書館現象的發掘及描述，而無法幫助我們解釋這些現象為什麼 (Why) 與如何 (How) 發生。布夏與哈特認為這是圖書館界忽視基礎性研究的後果。另一方面，圖書館學研究所在研究方法與理論上教育的不足也是原因之一。³⁸

除此之外，依照哈理斯歸納各家對前此圖書館學研究的批評，他認為下列數點是多位學者所共有的結論³⁹：

- 一、研究仍然作得太少。
- 二、已經完成的研究則在研究方法的採用上過於原始與簡單。必須進行更複雜的研究。
- 三、圖書館的研究缺乏典範 (Paradigm) ⁴⁰作為研究的遵循與指導。
- 四、需要更多的經費與合作，以維持研究的進展。
- 五、研究人員無法有效地與圖書館人員溝通。換句話說，他們研究的結果無法讓圖書館員有效地吸收。
- 六、圖書館員並沒有好好注意與閱讀已經完成的研究。

但哈理斯認為這些原因雖可解釋部份研究的問題，他認為原因更深及於規範性 (Normative) 及知識論的基礎層次。換句話說，多元典範的世界觀加上狹隘的實證主義者的知識論，大大地限制我們解釋與回答相關問題的能力。他認為我們其實並不缺乏研究，問題在於我們問了太多錯誤的問題，作了太多枝枝節節 (不重要) 的研究。⁴¹

伍、圖書館學的典範危機

哈理斯認為我們其實也有典範在指導我們進行資訊服務及進行各種研究。圖書館從業人員早就廣泛且不加批判地在應用這些典範，問題是圖書館人員或有意或無意地視而不見，就當作沒有一般。⁴²

哈理斯認為這個典範就是來自社會科學多元論者的典範觀 (Pluralist paradigm)。這個典範認為社會是各種經濟、宗教、種族、及地域團體勢力互相平衡的一個系統。每一個團體都可以影響社會決策的制定，而每一個團體的影響力亦被別的團體所制衡。但是所有的團體却都懷有共同的信仰與價值觀。也因此，在這個系統裏面的爭端與意見的不同，都可以透過既有的管道來解決⁴⁶。在圖書館界，這個多元的典範觀則將圖書館視為一個調和各團體需求，促進與維護美國式民主的機構。圖書館員則被視為一個不喜政治的人民公僕，被期望能在社會、經濟與政治的問題上採取完全中立的態度。換句話說，他們只能像鏡子一般，完全無意見地反映社會的價值與興趣⁴⁷。

在這種典範的影響下，乃產生了多種的主張 (Postulates)：

一、創作者

1. 所有美國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
2. 在出版品的發表管道上，每一個美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

二、出版者

1. 出版商對於出版的東西，必須站立在中立的立場。
2. 印刷媒體散播的管道是多元而開放的。

三、圖書館與圖書館員

1. 圖書館員必須服膺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款⁴⁸與圖書館權利法案⁴⁹的精神。基於此，圖書館員在資料的蒐集及服務上，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
2. 這種精神擴充到館藏方面，則是追求藏書的平衡，反應多元社會不同階層不同團體的需求。
3. 為了支持前二項，圖書館必須保持「職業的自主性」，以便自由地選購資料。
4. 為了達成 1 與 2 項工作，圖書館員必須擁有主題專業背景與繁雜的選書技巧。
5. 為了 1 與 2 的需求，圖書館必須擁有合適的經費支援。

四、圖書館讀者

1. 讀者有著多元的興趣。
2. 讀者必須接受圖書館員為他們選書的職業責任。
3. 透過傳統的利益團體管道，讀者可以影響圖書館的業務與政策。⁴⁵

哈理斯認為在這些典範觀下，圖書館的研究乃傾向於行政問題的研究，諸如效率 (Performance)、生產力 (Productivity) 及有用性 (Usefulness) 的調查，而其最終的目的則傾向於技術的尋求，冀望技術的使用可以解決這些問題⁴⁸。其結果則是產生大量政策導向 (Policy oriented) 的研究，目的僅在提供即時的解決方法，幫助圖書館作最有效的管理而已⁴⁹。

另外一方面，實證主義者的知識論也在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界產生了下列影響：

- 一、雖然不是很成熟，但圖書館學是一個真正的自然科學。也因此，所有科學的方法皆可適用於圖書館學。
- 二、圖書館必須被視為受一般法則 (General Laws) 所操控的複合體，而這些法則與理論的發現乃是圖書館學研究的主要目標。
- 三、這些法則與實務的關係是非常工具性的。換句話說，只要這些法則與理論被發現，我們即可用來解釋、預測與控制。換言之，這些理論性知識的應用可以幫助我們產生某些期望中的結果。
- 四、圖書館「科學家」在其崗位上必須保持完全中立的態度。⁵⁰

然而這個自孔德 (Auguste Comte) 與馬克斯 (Karl Marx) 以來極欲使社會科學等同自然科學的實證科學，在六〇年代已倍受攻擊。一如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所言，社會科學在追求如自然科學似的理論上，是完全失敗的。對於那些仍在等待「社會科學牛頓」的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他們「不只是等著一部永不會到達的火車，更嚴重的，他們站在錯誤的車站。」(Not only waiting for a train that won't arrive, they're in the wrong station altogether)⁵¹

吉登斯的主要論點，在於他認為我們不能研究社會的事實，一如研究自然世界的物體一般。在自然世界，因果的關係極易判定。在人類社會，社會不只是人所創造，社會亦型鑄人類。換句話說，人類在時空這個環境下，它與社會是不斷地在互動中的。自然世界的動植物受環境的影響極大，其行為有其不變性。但人類却隨時在調適自己，並且改變環境⁵²。也因此，吉登斯認為沒有任何社會過程是受永不改變的法則所左右，他認為人類是不可能為自然界的法則所規範的⁵³。吉登斯指出，社會與自然最大的不同乃在於社會是人所創造，自然則不是⁵⁴。基於這種認識，社會科學根本無法產生像自然科學似的理論或典範⁵⁵。

這也是為什麼哈理斯認為圖書館界，因為這種典範的影響，不僅忽視了社會、經濟、文化勢力對圖書館服務的影響的探討，而且，這種眼光更限制了圖書館界探討問題的範圍及回答問題的角度⁵⁶。其結果則如哈理斯所言：

1. 圖書館學的研究雖然愈來愈複雜，但也愈來愈瑣碎。

2.研究的結果只是一堆零碎的文獻，並沒有實質的累積。⑤7

陸、圖書館學研究的新典範

針對這個缺失，哈理斯認為我們必須放棄我們的舊有典範，重新架構適合我們的知識論，以幫助我們了解圖書館應該做什麼，以及為什麼要如此作⑤8。也因此，哈理斯提出了他架構出的替代性典範（Alternative paradigm），希望有助於圖書館界的重新出發。在這個替代性的典範裏，最重要的概念即是：政府的決策並不是各種壓力團體平衡施力的結果。相反的，政府傾向於為優勢團體（Dominant class）的利益而服務。⑤9

哈理斯的這個觀念其實主要來自葛蘭西（Gramsci）的「意識形態的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所謂意識形態的霸權，乃是指著在資本主義者的社會裏，優勢團體利用各種大大小小的組織或機構來影響一般人民的思考模式。在這種社會結構裏，知識份子扮演一種為統治團體實行霸權的角色，進行漸次為廣大民衆洗腦的工作⑥0。而這種影響的工作即是透過各種傳播媒體、公共機構如圖書館及學校等，選擇性的強調某種文化產品或訊息，而刻意地忽視或消除其他文化的產品或訊息⑥1。

這也是哈理斯希望圖書館界需要反省的原因。因為在以前圖書館員所自以為中立的立場，經過社會學與政治學的分析，竟被證明為虛假的。事實上我們也只不過是一個被選定的傳播工具而已。以前我們自封是「文化的使徒」（Apostles of culture），並念茲在茲地想要提升讀者的水準，其實只是為了上層文化（High culture）及優勢團體推行理想罷了⑥2。而這些上層文化階級明顯地反對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因為他們認為大眾文化是粗製濫造的，這種文化產品將對上層文化產生不良影響，而且更會對讀者產生有害的負面影響。而最後也最嚴重的影響則是整體社會的文化水準將會受到莫大的影響，而他們更擔心煽動家有可能利用這種作品結合一批被動的讀者（Passive reader）造成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成長⑥3。

而這些上層文化的產品又如何留傳的呢？一般而言，文化的傳遞必須經過下列管道的過濾：

- 一、創作者
- 二、出版者
- 三、評論家（包括大學的教授）
- 四、機構性的消費者（書店、圖書館、教育機構）
- 五、讀者

在這種篩選的過程中，前面三種團體決定一本書是不是要出版，甚或一本書會不會成為經典作品^④。換句話說，前面三種團體可以決定圖書館的館藏，及讀者必須讀什麼書，圖書館及教育機構只是資訊的散播者而已。書籍的來源及書籍的好壞圖書館及讀者皆無能為力。也因此，作者、出版者、書評家的意識形態常會主導書籍的出版方向，及思潮的發展。因為他們才是資本社會的優勢團體，他們掌控了出版及傳播機器，他們的腦袋想什麼，一定會反應在其出版的方向及趨勢。讀者縱有影響力，其影響亦微乎其微。而圖書館亦不過只是一個傳播媒介，它所能作的亦只是上層文化的儲存、整理、與推廣罷了。

由於這種分析，哈理斯乃提出他的理論，認為在創作（Produce）與再製作（Reproduce）優勢團體文化成品的各種團體中，圖書館只是一個邊際機構（Marginal institutions）而已。而且，整個社會的權力分布是不均衡的。某些機構，例如出版者、書評家被賦予創造與生產文化產品的權力。而某些機構，如圖書館，則被受限於僅能傳播與再製造這些文化成品；圖書館的結構的與功能已被定義為優勢文化產品進行消費、保存、傳播、與再製的工作而已。^⑤

由這個理論，哈理斯乃提出他的主張（Propositions）：

1. 在本質上，圖書館的館藏為書籍與期刊。
2. 只有在創作者與出版者決定產銷不同於印刷媒體的文化產品時，圖書館以書刊為主要蒐藏品的情況才有可能改變。
3. 任何企圖重新定位圖書館應加強大眾文化的舉動，將會受到高級文化產銷機構的強烈反擊。
4. 任何企圖透過合作或使用非書媒體，來減少高級文化產品在圖書館館藏的作法，都會受到強烈地抵制。
5. 高級文化的創作者與出版者希望圖書館能蒐藏他們的產品，而不用考慮這些產品會不會被使用。
6. 高級文化的創作者與出版者認為圖書館沒有能力創造、出版、及合法化（Legitimate）高級文化的產品，而圖書館員任何企圖想參與這個創造與生產的舉動亦將會遭受強烈的抵制。
7. 高級文化的創作者與出版者雖然反對檢查制度（Censorship），但却贊同圖書館應該基於他們的同意，建立一套劃一標準及中立性的館藏。
8. 定義一本書是不是經典（Canon）的權力，是不平均地被操控在創造及出版高級文化產品的團體手中。
9. 圖書館員的生存直接地依附著高級文化的創作者與出版者。
10. 圖書館員是高級文化的倡導者，縱然有些圖書館員想激烈地改變這種現狀，但却會遭到大部份圖書館員的抵制。

11. 圖書館員蒐集、組織、保存、及傳播高級文化的印刷媒體。
12. 圖書館所選購的高級文化產品，乃是圖書館員透過高級文化創作者與出版者所認可的書評、書目等工具所選擇而來的。
13. 只要透過這些少數的選書工具，全國的圖書館員都可以建立一個非常劃一標準的館藏。
14. 也因為這些選書工具乃是不平均的操控在高級文化的創作者與出版者手上，因此，某些創作者與出版者的出版品一定比他們同業的出版品更有可能被圖書館所選購。
15. 圖書館員反對檢查制度，但他們却以習慣性與中立的態度自選書工具選書。
16. 因為圖書館員傾向於以習慣性與中立的選書態度依靠選書工具來決定館藏，比起來，我們所能發現由圖書館員進行的書籍檢查（Censorship）的例子實在很少。
17. 由於圖書館員選書係基於選書工具，他們在考慮潛在讀者的需求時就顯得非常曖昧。
18. 如果有任何證據抵觸圖書館員對「讀者」一詞所下的抽象定義時，圖書館員會有意地忽視或扭曲這些證據。
19. 圖書館員喜歡責難讀者的不愛使用圖書館。
20. 美國人的讀寫能力依著階級的不同而有顯著的差異。
21. 大部份的美國人無法解讀圖書館的館藏。
22. 大部份的美國人不使用圖書館。
23. 常使用圖書館的人是熟練的讀者（Skilled readers）。
24. 常使用圖書館的人，最主要的是去使用書籍或期刊。
25. 因為階級層次的差異，圖書館乃有使用者與非使用者的不同。
26. 圖書館可以再造這些階級間的關係。^⑤

柒、結 論

自從哈理斯發表其替代性的典範後，雖然也招致一些批評，但有些批評基本上並非針對該文的內容，而是對於哈理斯口氣的過份自滿及獨斷而發^⑥。例如伯根（Dan Bergen）即認為對於研究人員而言，我們的思考模式應該不能只限於一種方向。因此，如果有人喜歡多元論者的典範觀，而執著技術尋求，那又何妨？而如果有人認為哈理斯的典範有用，他大可依其理論開始進行研究^⑦。

然而，不可否認地，哈理斯的「自滿」確也指出了殘存在圖書館從業人員潛

意識中的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已經跟隨圖書館員很長一段時間，如果我們不知去解剖它、去修正它，則我們將永遠也無法突破並改變它。這恐怕是哈里斯最大的貢獻了；至少他幫助我們重新省視我們自己。不管他的理論及典範是否真能在科學的驗證下長存，但他的批判能力至少可以讓他在圖書館學的研究史上留下一段記錄的！

附 註

- ① H. Curtis Wright, "Inquiry in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3 (Summer 1978): 252.
- ② J. H. Shera, "Darwin, Bacon, and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Library Trends* 13 (July 1964): 144.
- ③ Charles H. Busha and Stephen P. Harter, *Research Methods in Librarianship: Techniques and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8.
- ④ L. Houser and Alvin M. Schrader, *The Search for a Scientific Profession: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U. S. and Canada* (Metuchen, N. J.: The Scarecrow Press, Inc., 1978), 24.
- ⑤ C. C. Williamson, "The Place of Research in Library Service," *Library Quarterly* 1 (January 1931): 3.
- ⑥ John Wilkinson, "The Legitimization of Librarianship," *Libri* 33 (1983): 37.
- ⑦ Ibid., 39.
- ⑧ Thomas W. Shaughnessy, "Theory Building in Librarianship," *Journal of Library History* 11 (April 1976): 167.
- ⑨ Ibid., 174.
- ⑩ Charles H. Busha,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The Path to Progress," in *A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Reader and Bibliographic Guide*, ed. Charles H. Busha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1981), 3.
- ⑪ W. Boyd Raywar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s: Disciplinary Differenti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vergence," in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Interdisciplinary Messages*, ed. Fritz Machlup and Una Mansfiel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83), 350.
- ⑫ Herbert Goldhor,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in Librarianship* (Urbana,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Graduate School of Library Science, 1972), 92.

- 13 Ibid.
- 14 Houser and Schrader, 24.
- 15 Ibid.
- 16 Busha, 9.
- 17 Ibid., 10.
- 18 Ibid., 9.
- 19 Ibid., 12.
- 20 Ibid.
- 21 Ibid., 18-19.
- 22 Ibid., 20.
- 23 Ibid., 14.
- 24 引自 Busha, 頁25. 本文請見 Nancy D. Lane, *Characteristics Related to Productivity among Doctoral Graduates in Librarianship*,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5.
- 25 Busha, 25.
- 26 Thomas Childers, "Will the Cycle be Unbroken? Research and Schoo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Library Trends* 32 (Spring 1984): 528.
- 27 Ibid., 525.
- 28 Michael H. Harris, "The Dialectic of Defeat: Antimonies in Research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Library Trends* 34 (Winter 1986): 515.
- 29 Williamson, 29.
- 30 Ibid., 9.
- 31 Ibid., 10.
- 32 Laurel Grotzinger, "Methodology of Library Science Inquiry-Past and Present," in *A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Reader and Bibliographic Guide*. ed. Charles H. Busha (Littleton, Colorado: Libraries Unlimited, Inc., 1981), 46.
- 33 Rayward, 351.
- 34 Shera, 147.
- 35 Goldhor, 3.
- 36 Ibid.
- 37 Ibid.
- 38 Busha & Harter, 8.
- 39 Michael H. Harris,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Toward a Theory of Library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14 (1986): 211-12.

- ④① 這個名詞主要來自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0-11. 中文譯本請參考王道還編譯, 科學革命的結構 (台北: 允晨文化有限公司, 民74年), 頁六十。庫恩主要認為在常態科學 (Normal Science), 任何科學的成就或著作如果具有下列二項特性, 即可被稱為典範 (Paradigms): 第一, 作者有著空前的成就, 而且能從敵對學派中吸引歸附者。第二, 著作中引出許多問題可供追隨者進行研究。而這一些典範, 包括了科學研究中實際操作的範例, 如定律、學說、理論、應用、實驗工具和方法。庫恩認為一個科學研究傳統, 不論多麼專門, 學者加入這一科學社群參與研究, 都是主要研究它的典範入手。研究者以共有的典範為基礎, 就能信守相同的研究規則及標準。這種信守的態度及因而產生的明顯共識, 是常態科學, 也是某一特定研究傳統發生與延續的先決條件。
- ④② Harris,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212.
- ④③ Ibid., 213.
- ④④ Ibid., 214.
- ④⑤ Ibid., 215.
- ④⑥ Ibid., 215-16.
- ④⑦ 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款 (First Amendment) 規定國會不能創立任何法案干涉人民的宗教、言論、出版、集會、與請願的自由。
- ④⑧ 圖書館權利法案 (Library Bill of Rights) 是美國圖書館學會於 1939 年為讀者的權利所提出的法案。它歷經數度修正, 1967 年的修正款包括六個條文:
- 第一條 指明圖書館員的選書必須基於社區讀者的需要, 不能因為作者的種族國籍或其社會、政治、與宗教的立場而被排除。
- 第二條 指明圖書館應該提供各種立場的書刊, 不能因為黨派或主義信仰的不同而被排除。
- 第三條 則要求圖書館員必須挑起衛護資訊自由的責任, 站起來與任何形式的檢查 (Censorship) 制度抗爭。
- 第四條 指出, 為了衛護言論與思想自由, 圖書館員必須與所有人類或任何團體結合起來共同努力。
- 第五條 指明讀者使用圖書館的權利不能因其年紀、種族、宗教、國籍、或其社會與政治意見的不同而被剝奪。
- 第六條 指出圖書館的會議廳應該開放給任何有興趣的團體, 不應因他們的信仰與性質而被限制。
- ④⑨ Harris,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216.
- ④⑩ Ibid.
- ④⑪ Ibid., 219-220.
- ④⑫ Anthony Giddens,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 Critiqu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76): 13.
- 52 Anthony Giddens, *Sociology: 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1986): 220.
- 53 Giddens, 1976, 22.
- 54 Ibid., 54.
- 55 Harris,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220.
- 56 Ibid., 221-2.
- 57 Ibid., 222.
- 58 Ibid.
- 59 Ibid., 223.
- 60 Ibid., 224-5.
- 61 Ibid., 225.
- 62 Ibid., 228.
- 63 Ibid., 230.
- 64 Ibid., 235.
- 65 Ibid., 242.
- 66 Ibid., 242-244.
- 67 Dan Bergen, review of *State, Class,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Toward a Theory of Library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Michael H. Harri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9 (1987): 75.
- 68 Ibid.